

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与 城市群发展特征研究

王桂新 魏 星 刘建波 张伊娜

【摘 要】 文章主要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空间结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城市群的发展等几个方面,考察了这一地区城市化与城市群现状及其发展特征。文章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目前尚处初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大城市群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今后应以国家战略推进这一地区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 长江三角洲地区 城市化 城市群

【作 者】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魏 星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建波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生;张伊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生。

城市化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而城市群又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化与城市群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带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能源”和“引擎”。上海地区的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先导;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在全国各城市群中具有明显“首位”优势,曾被法国学者戈特曼氏称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也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人口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区外人口的集聚入迁和区内人口的再分布,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及城市群迅速发展。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正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牵引经济增长、参与世界竞争的“龙头”、中心和世界级城市群。

为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化与城市群的发展,使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在中国牵引经济增长、参与世界竞争中发挥更大的“引擎”作用,必须加强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与城市群的研究和把握。本文拟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空间结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城市群的发展等几个方面,考察长三角地区城市化与城市群的现状基础及发展特征,为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化与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所指的长三角地区,包括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经济协调会”所属的上海市及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16个会员城市所辖地区;所用的资料主要为各城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各城市1990年以来历年统计年鉴及其他相关资料。

一、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发展特征

长三角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腹地广阔富饶,市场环境良好;交通基础设施及

科技、教育都比较发达,而且具有良好的历史发展基础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机遇。明显的区位优势及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机遇,使长三角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迅速发展。到 2003 年,长三角地区 16 城市的面积为 10.95 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8 161.01 万人,国民生产总值(GDP) 23 797.63 亿元,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总人口及 GDP 的 1.14%、6.32% 和 20.39%,单位土地面积(1 万平方公里)GDP 为 2 173.30 亿元,人均 GDP 为 29 160 元,发达水平高居全国前列。

发达水平高居全国前列的长三角地区,其城市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城市化稳步发展,城市化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的迅速增长带动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长三角地区(16 城市,下同)以城镇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已达 57.84%,比全国平均水平(36.09%)高出 21.75 个百分点;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为 39.53%,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08%)。

从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来看^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发展比较稳定,水平持续提高。如图 1 所示,长三角地区 1990 年非农业人口为 2 332.10 万人,约占全区户籍人口的 30.21%,到 2002 年增长到 3 346.40 万人,占全区户籍人口的比重也进一步提高到 41.21%,比 1990 年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大致每年上升 0.9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此间长三角地区户籍人口增幅不大,1990 年为 7 719.54 万人,到 2002 年也只增加到 8 121.04 万人,可见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推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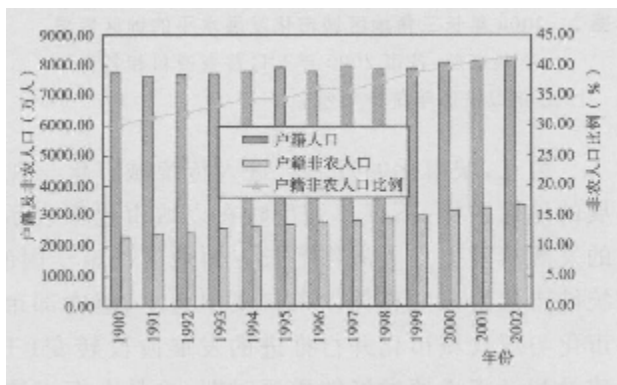


图 1 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进程(1990~2002 年)

资料来源:各市 1990 年以来历年统计年鉴。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用非农业人口比重(城市化率)表示城市化水平无疑将低于实际城市化水平,也低于以城镇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水平,但以此考察城市化发展进程的相对变化还是可以参考的,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大致反映城市化实际发展进程的相对变化特征。这一点,从图 2 所示以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总体呈相似的变化趋势也可得以说明。

第二,城市化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但内部差异明显。一方面阶层等级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市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如 2000 年,中心城市上海的城市化水平最高,以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分别为 88.31% 和 74.62%,均显著高于江、浙两省的城市;江、浙两省的中心城市南京和杭州,其以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也都分别居前五位;而阶层等级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则城市化水平一般较低。如湖州、南通两市,其以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都位居榜尾,水平不高。特别是南通市,2000 年以城镇人口比重和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仅分别为 33.54% 和 16.61%,在长三角地区 16 个城市中水平最低,甚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 2)。另一方面江苏部(8 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浙江部(7 城市),而且城市化发展速度亦快于浙江部。如图 3 所示,江苏部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 1990 年为 25.83%,到 2002 年提高到 39.12%,平均每年上升 1.1 个百分点;而浙江部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 1990 年为

① 由于以城镇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缺乏连续数据,无法用以进行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时间序列的考察,而且用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受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较小,相对比较稳定。

18.54%，到 2002 年提高到 27.64%，平均每年只上升 0.75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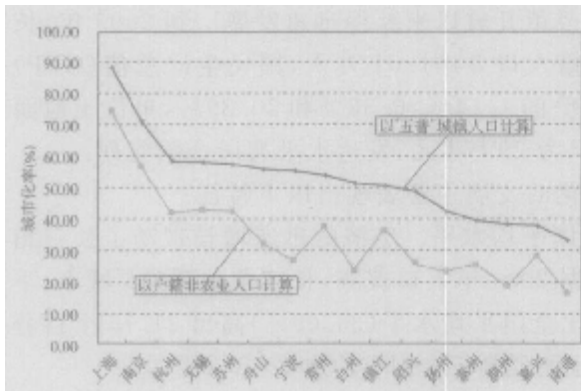


图 2 2000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

资料来源：各市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各市

1990 年以来的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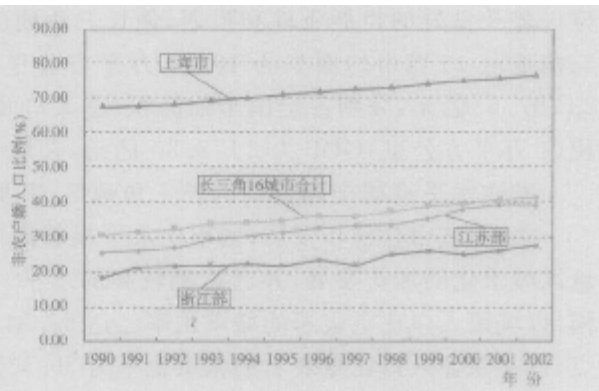


图 3 1990~2002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地区差异

资料来源：同图 1。

第三，城市化的发展已进入传统城市化与现代城市化并行推进阶段。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不仅单纯反映在以城市化率表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上。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甚至全国的中心城市，已率先由单纯以人口集中为主的传统城市化阶段向整体以人口集中为主、但内部市中心地区已明显出现人口扩散、减少的传统城市化与现代城市化并行推进的发展阶段转变（王桂新，1988）。20 世纪 90 年代，既是上海城市建设和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上海以市中心地区人口扩散、减少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城市化加速推进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但长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城市目前仍都处于以人口集中为主的传统城市化发展阶段，有些阶层等级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甚至还处于以人口净迁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发展初期主要受区域中心城市“逆流”作用的阶段。如江苏部的泰州、南通和浙江部的绍兴、台州等城市，目前相对长三角区内中心城市都仍处于人口净迁出状态。所以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目前已基本进入以人口集中的传统城市化为主、传统城市化与现代城市化并行推进的发展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建设和发展。

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空间结构特征

根据系统论的视角考察，城市及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复杂的自组织过程，而城市群又是城市及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就是该地区城市及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城市群是由若干个城市或城市圈相对集中、连绵分布在某一区域而形成的空间组合体，各城市在空间上处于一定的网络结点，在人口、产业经济活动等方面形成比较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王桂新等，2003），所以作为城市及城市化自组织发展过程及其结果，使城市群系统形成了两个相互依存和联系的重要特征，即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等级结构和空间网络结构。其中，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等级结构，反映了城市群系统中各城市的功能定位、规模等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城市群系统的空间网络结构，则是城市群系统阶层等级结构的空表现。实际上，这是城市群系统结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分别从以上两个方面考察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空间结构及其特征。

（一）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等级结构及其特征

根据 2000 年行政区划，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共有县级以上城市 58 个，考虑某些城市的历史

发展、区划变动及现状特征,有 5 个县级市被分别并入所在地级以上城市,所以使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只有 53 个县级以上城市(见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2000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 53 个县级以上城市,主要根据人口规模并参考其功能定位,可大致划分为 5 个阶层等级。最高阶层等级为中心城市上海市,人口规模最大,不仅是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龙头”和中心,而且是全国的“龙头”和中心;第二阶层等级包括南京和杭州两个省级区域中心城市,在两市主要发挥政治、行政中心的作用;第三阶层等级主要包括苏州、宁波等四大城市,这一阶层等级的城市,虽然既非政治、行政中心,人口规模也不很大,但这些城市(主要指苏州、宁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在两市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中心的作用;第四阶层等级主要包括扬州、镇江、南通、台州、常熟、昆山、嘉兴、张家港等 8 个城市,这一阶层等级的城市,多为地级以上城市,是地级区域的中心城市;第五阶层等级城市,包括 38 个县级以上城市,这一阶层等级的城市主要为县级市,只有绍兴、湖州、泰州和舟山 4 个地级市。如果把一些未设市制的县城镇包括在内,该阶层等级则包括 69 个城市(镇)。

根据齐夫(Zipf G. K.)等人研究提出的城市规模顺序分布规律,若将城市人口规模按由大到小顺序排列,处于排序位次 r_i 位的城市 i 的人口规模为 P_i ,则其顺序位次 r_i 和人口规模 P_i 之乘积为一常数,以 M 表示,即有: $r_i^B P_i = M$;两边取自然对数(亦可取常用对数),并变换可得: $\ln P_i = \ln M - B \ln r_i = A - B \ln r_i$ 。其中, $A (= \ln M)$ 、 B 为参数,又可称之为顺序规模分布指数。在理论上,常数 M 应为考察城市中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r_i = 1$)。

根据 $\ln P_i = \ln M - B \ln r_i = A - B \ln r_i$ 对 2000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 53 个县级以上城市的规模顺序分布进行分析(见图 4),可得:

表 1 2000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县级以上城市规模阶层等级结构

规模阶层结构	各阶层城市数量	各阶层所含城市名称及主要城市人口规模(万人)
合 计	53	
大于 1000 万人	1	上海(1253.11)
100~350 万人	2	南京(317.06)、杭州(177.21)
50~100 万人	4	苏州(86.37)、无锡(78.08)、 常州(79.61)、宁波(66.98)
25~50 万人	8	扬州、镇江、南通、台州、常熟、昆山、 嘉兴、张家港 绍兴、余姚、湖州、溧阳、诸暨、富阳、 临海、靖江、泰兴、通州、江阴、泰州、 如皋、宜兴、慈溪、启东、江都、靖州、 海山、海宁、太仓、兴化、姜堰、仪征、 高邮、溧水、上虞、海门、吴江、金坛、 李化、丹阳、平湖、桐乡、临安、句容、 建德、扬中
小于 25 万人	38	

注: (1) 人口规模为 2000 年人口普查常住人口。(2) 有底色的为地级以上城市。(3) 上海城市地区划定包括中心城 9 区和近郊浦东、宝山、闵行、嘉定 4 区。(4) 考虑城市历史发展、区划变动及现状特征,将 2000 年尚有的以下 5 个县级市分别划入相应城市: 余杭、萧山划归杭州, 锡山划归无锡, 武进划归常州, 吴县划归苏州; 另外, 还将鄞县划归宁波, 邗江县划归扬州, 丹徒县划归镇江。

资料来源: 各城市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begin{aligned} \ln P &= 6.145 - 0.978 \ln r \\ (56.761) \quad (-28.461) \\ (Adj. R^2 &= 0.940) \end{aligned}$$

分析显示: (1) 所得回归方程调整后的说明系数高达 0.940, 说明 2000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阶层等级结构很好地符合城市规模顺序分布规律; (2) 顺序规模分布指数 B 小于 1, 又说明目前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分散化作用为主(王桂新, 1997), 亦即目前长三角地区城市群较小规模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 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异渐趋减小, 整个城市群系统阶层等级结构逐步向人口规模差异较小的均衡状态演变。

(二) 城市群系统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特征

由于长三角地区各地自然环境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及经济社会结构不同, 不仅使各地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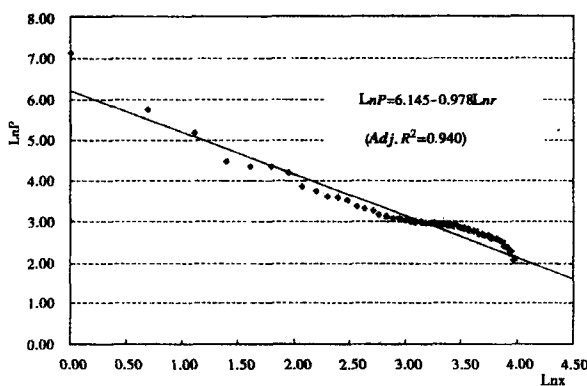


图 4 2000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系统的
城市规模—顺序分布模型分析
资料来源:同表 1。

明显大于浙江部的城市。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和以上城市定义,江苏部县级以上城市平均规模为 36.18 万人,而浙江部县级以上城市平均规模只有 28.29 万人,前者为后者的 1.3 倍。显然,这与以上所考察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特征是一致的。

第三,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已初步形成了几个次级区域性城市圈或城市群。除上海市域已形成

表 2 2000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县城
以上城镇(市)的地区分布

城市	面积 (平方公里)	县级以上城市		县城以上城镇(市)	
		个	个/万 平方公里	个	个/万 平方公里
合 计	109524	53	4.8	84	7.7
上海市	6341	1	1.6	7	11.0
江苏省	48383	31	6.4	39	8.1
浙江省	54800	21	3.8	38	6.9
南京市	6598	1	1.5	6	9.1
无锡市	4650	3	6.5	3	6.5
常州市	4375	3	6.9	3	6.9
苏州市	8488	6	7.1	6	7.1
南通市	8001	5	6.2	7	8.7
扬州市	6638	4	6.0	5	7.5
镇江市	3843	4	10.4	4	10.4
泰州市	5790	5	8.6	5	8.6
杭州市	16596	4	2.4	6	3.6
宁波市	9365	4	4.3	6	6.4
嘉兴市	3915	4	10.2	6	15.3
湖州市	5817	1	1.7	4	6.9
绍兴市	8256	4	4.8	6	7.3
舟山市	1440	1	6.9	3	20.8
台州市	9411	3	3.2	7	7.4

注:根据行政区划,2000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 16 城市共有 58 个县级以上城市、87 个县,因有 5 个县级市和 3 个县城镇分别并入有关城市,故有以上表中数量。土地面积根据各市统计年鉴,人口数同表 1。

化的发展存在很大不同,而且也使城市的空间分布形成明显差异(见表 2、图 5)。

第一,上海市、江苏部和浙江部城市(镇)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如从县城以上城市(镇)的空间分布来看,在最发达的中心城市上海市域,大约每 1 万平方公里有 11 个城市(镇),地势平坦、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江苏部每 1 万平方公里也分布有 8.1 个城市(镇),经济虽较发达但山地丘陵分布较多的长三角地区浙江部则每 1 万平方公里只分布有 6.9 个城市(镇)。

第二,长三角地区江苏部、浙江部城市(镇)空间分布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江苏部的城市(镇)分布密度高于浙江部,而且其城市规模也

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大都市圈以外,在江苏部也已初步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城市的苏(州)、(无)锡、常(州)环太湖城市群(或城市带);以南京为中心城市的宁、镇(江)、扬(州)城市群;在浙江部初步形成了以杭州、宁波为中心城市的杭州湾城市群。

三、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与 城市化、城市群的发展

因为在长三角地区,不少城市(如上海、苏州、南通等)的户籍人口已出现自然负增长,即使未出现自然负增长的城市,其自然增长率一般也都保持比较稳定的低水平,而且各城市之间差异很小,所以各城市的人口增长及其差异几乎都主要是由人口迁移变动形成的。这决定了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迁移过程也就是该地区城市、城市化及城市群的发展过程,正是人口迁移、特别是人口迁移规模及其空间流向分布,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城市化及城市群的发展。

(一) 人口迁移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市 化及城市群的发展

1. 人口迁移加快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发展

首先,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之一,集聚了大量区外迁入人口。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即成为全国主要人口迁入地区,到1990年代后期,人口迁入规模进一步增大。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长三角地区自江浙沪以外28省市迁入人口为472.32万人^①,江、浙两省长三角以外地区迁入人口为133.16万人,二者合计达605.48万人(净迁入495.37万人),约占2000年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8743.13万人)的6.93%。而且如表3所示,总迁入人口中约有六成以上来自乡村、为农业户口,如果扣除市内迁移,特别是从省际迁入人口来看,则迁入人口主要来自乡村、为农业户口。从不同阶层城市迁入人口的迁出地类型和户口性质来看,总体趋势随着城市阶层的降低,来自乡村、为农业户口的迁入人口比例大幅上升,如阶层较低的苏、甬两市和“其他11城市”,二者的比例已都占到七成以上。因此从全局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区外)人口迁移加快了全国城市化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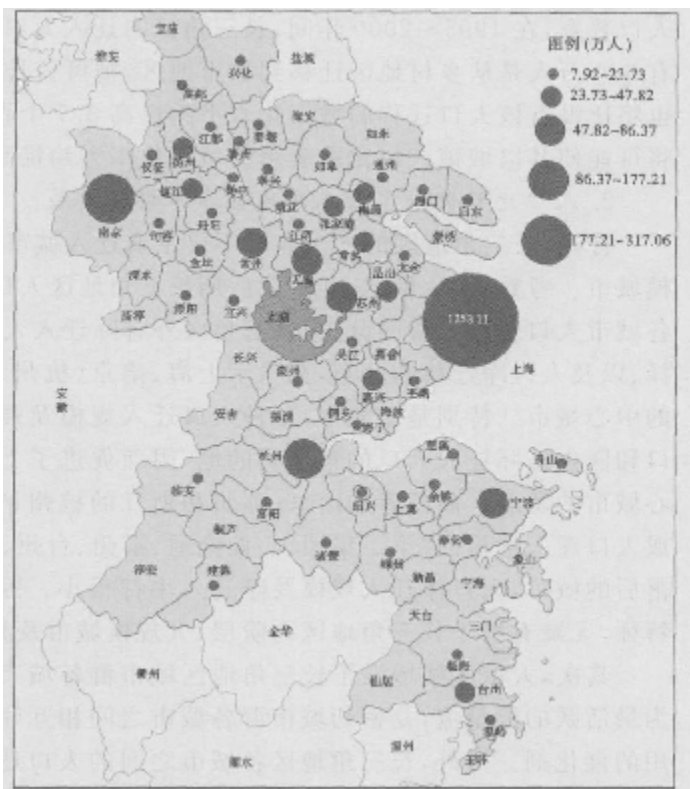


图5 200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县级以上城市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同表1。

其次,长三角地区的迁入人口几乎都集中迁入到城市地区。(1)长三角区外特别是省际迁入人口几乎都集中迁入到城市地区。因为长三角地区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分布在城市地区,这就决定了迁入人口特别是来自长三角地区以外的迁入人口主要选择向城市地区集中迁移,并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

人口迁入扩大了城市人口规模,加快了城市人口增长,提高了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如果假定长三角地区以外迁入的605.48万人基本都迁移到城市地区,则仅区外人口迁入就可使长三角地区以城镇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比没有该人口迁移的城市化水平约提高3.1个百分点。(2)同理,长三角区内迁入人口也主要是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区。根据2000年

表3 长三角地区不同阶层城市迁入人口的迁出地类型及户口性质

	合计	上海	南京和杭州	苏州和宁波	其他11城市
迁出地类型					
乡村	64.98	50.98	59.99	80.77	75.55
市镇	35.02	49.02	40.01	19.23	24.45
户口性质					
农业	61.32	49.16	50.80	78.19	72.64
非农业	38.68	50.84	49.20	21.81	27.36

注:(1)本表所指人口迁移包括省际、市际及市内区县之间的迁移(因抽样样本太小不宜进一步细分)。(2)迁出地类型中的市镇迁出人口为街道与镇居委会迁出人口合计,乡村迁出人口为乡迁出人口与镇村委迁出人口之和。(3)表中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0年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数据计算。

^①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1‰人口抽样数据时,均按实际样本比0.95‰推算总体人口数。

人口普查,在1995~2000年间,长三角区内迁入人口约为458万人,如果其中有七成、即假设约有320万人是从乡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则可使长三角地区以城镇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也将比没有该人口迁移的城市化水平约提高3.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迁移将可能使其以城镇人口比重表示的城市化率大约提高近7个百分点。

2. 人口迁移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发展

首先,长三角地区的迁入人口不仅主要迁入城市地区,而且还主要选择迁入到高阶层、大规模城市。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后,我们发现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人口总迁入量的分布、长三角区外省际迁入人口和区内城际迁入人口对迁入目的地的选择、以及人口净迁移的分布,都显示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大城市已成长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上海市,各种人口迁入规模及强度都很大,而且是长三角区外省际迁入人口和区内城际迁入人口的首选目的地,因而促进了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阶层最高中心城市的发展。而江苏的南京、苏州和浙江的杭州、宁波四大城市,在长三角地区16城市中构成人口迁入选择的“第二集团”。而南通、泰州、台州、绍兴等层次较低、规模较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人口净迁入规模及净迁入率都很小。因此,人口迁移的这一流向选择和流量集中特征,无疑有助于长三角地区高阶层、大规模城市及整个城市群系统的发展。

其次,人口迁移增强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人口迁移流,作为最活跃的能量流,是密切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增强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催化剂。另外,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不仅城际人口净迁出城市和净迁入城市同时并存,而且在地域上由分散趋向相对集中的人口迁移主流和在城市群系统阶层等级结构上由低阶层城市流向高阶层城市的人口迁移主流亦同时并存。即在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其城际人口迁移存在由低阶层流向高阶层、由分散趋向相对集中的“立体”人口迁移主流,这一“立体”人口迁移流,强化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系统的阶层等级—空间网络结构及联系,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演化和发展。

(二) 人口迁移与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及城市群发展中的问题

由于人口迁移分布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使人口迁移在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及城市群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第一,大城市对人口入迁的控制,已开始导致其中心性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入迁人口主要选择迁向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高阶层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中心城市的地位,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以及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政策的影响,如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往往对人口入迁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政策,这样就制约了人口入迁及其所带来的人口增长,而低层次城市对人口入迁的控制则大多比较宽松,由此促成了城市人口相对较快的增长。如图6所示,在1995~2000年间,虽然迁入人口规模与城市阶层等级存在密切正向关系,城市阶层等级越高,迁入人口规模越大,但不同阶层城市迁入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不同,总体表现是除阶层最高的中心城市上海以外,其他各阶层城市的迁入人口规模均呈持续增大趋势,而且层级越低迁入人口规模增势愈强,以层级较低的“其他11城市”迁入人口规模增势最强劲。阶层最高的中心城市上海市虽然迁入人口规模最大,但波动比较明显,且在1998年达到峰值以后呈衰减趋势。次级中心城市南京和杭州两市迁入人口规模的增势也自1999年起趋弱。人口迁移及其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的差异,已影响最高阶层中心城市上海市的中心性趋弱,首位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显示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地位已面临挑战。如表4所示,1996年上海三城市指数和五城市指数为0.7453和0.6488,到2000年分别下降为0.7081和0.6177,显示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其人口规模相对于江苏、浙江四大城市的中心性呈明显下降趋

势。上海的人口首位度虽有所提高,但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变动造成的。如在此期间,南京市只撤销江宁县新设一个江宁区,而上海则先后撤消金山、松江、青浦三县新设3个区,由此使上海因行政区划变动新增市区人口明显多于南京,并造成其首位度有所上升的假象。由于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GDP)规模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0.9以上),所以上海人口中心性指数的下降,将意味着其经济中心性的下降,可以说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体系中的中心城市地位已面临挑战。

第二,人口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力的逆转,使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系统在阶层等级规模普遍增大的同时渐趋均衡。根据城市顺序规模分布模型的分析结果(见图7),199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顺序—规模分布模型的参数A、B为6.489和1.081,到2000年分别变化为6.527和0.987,A有所增大,B趋向减小,二者呈反向变化。一般地说,参数A增大,说明迁移人口向城市系统所有城市迁移,从而使各种规模的城市均呈人口增加、规模扩大趋势;1996年参数B大于1,说明当时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尚以统一化作用为主导,但到2000年参数B即减小到小于1,说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已转变为以分散化作用占上风,迁移人口相对主要向阶层较低的中、小规模城市迁移“集中”,从而使城市群系统各城市规模之间的差异缩小,渐趋均衡。因此,以上参数A、B的变化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系统在各城市规模普遍增大的同时,其内部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由统一化作用为主转变为以分散化作用为主,从而使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系统规模阶层等级结构呈差异减小、渐趋均衡态势。

第三,主要由于行政区划、距离临近性及社会、经济、历史联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区内城际人口迁移分别形成了江苏部和浙江部两个相对独立的城际人口迁移区(圈),影响了江苏部和浙江部两地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的相互融合。根据对长三角区内城市迁出人口对迁入目的地选择模式、迁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布特征以及人口迁移流向、流量的考察得知,由于主要受行政区划、距离临近性及社会、经济、历史联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江苏部城市的城际迁入人口主要来源地为邻近的江苏部城市;浙江部城市的城际迁入人口主要来源地为邻近的浙江部城市。或换言之,江苏部城市的迁出人口主要选择邻近的江苏部城市为迁入目的地,浙江部城市的迁出人口主要选择邻近的浙江部城市为迁入目的地。即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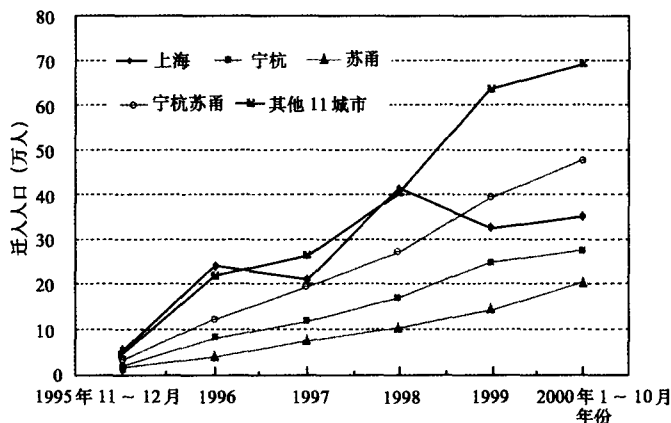


图6 1995~2000年长三角地区不同层次城市
年迁入人口的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同表3。

表4 以人口规模表示的上海中心性指数的变化

指标	1996	2000	计算城市
首位度	3.5675	3.9266	上海市区人口/ 南京市人口(下同)
三城市指数	0.7453	0.7081	上海/南京、杭州
五城市指数	0.6488	0.6177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宁波

注:(1)根据各城市市区户籍人口计算。(2)2000年上海市首位度的计算剔除了1995~2000年上海、南京市撤县建区变动的影响。

资料来源:1997~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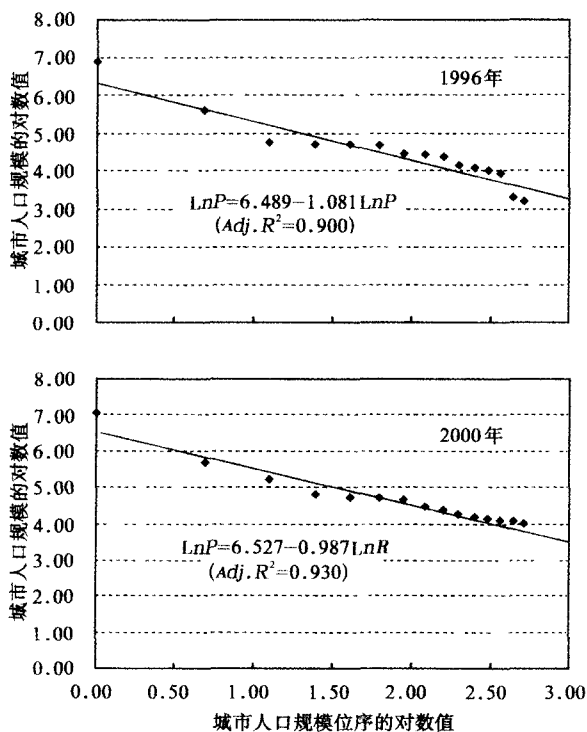


图7 1996和200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系统的
城市规模—顺序分布模型分析

资料来源:1997、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苏部和浙江部的城际人口迁移,均以江苏部和浙江部内部的城际人口迁移为主。这一人口迁移特征,影响了两地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的相互融合,使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在上海以外分别形成了江苏部和浙江部两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区。

四、结束语

综括上述可知,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还相对滞后,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发育也还很成熟,基本上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根据发达国家大城市群(圈)的发展经验,一个发育比较成熟的城市群,群内各城市之间联系十分密切、发展比较均衡、阶层—空间结构合理、协调联动发展特征明显。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群(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群),都是经济高度发达、掌控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据点”。而在这些方面,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显然都还存在明显差距。如长三角地区各城市虽然集聚在一起,在地域上构成城市群“景观”形态,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也都已

“达标”,但缺乏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协调联动发展的本质内涵;从人口迁移来看,各城市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够密切(甚至相互分割),主要受发展体制、行政区划、距离邻近性及社会、经济、历史联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还很不均衡,远未形成整体性联动发展的内在机制。不仅江苏部和浙江部城市缺乏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区,即使在江苏部和浙江部内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作为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中心城市的上海市,其中心性甚至呈一定弱化趋势。因此可以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总体上尚处相对比较松散、内部差异明显、中心城市弱化、有待进一步整合发展的初期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具有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巨大潜力,但要真正建成世界级城市群还必须进一步付出艰苦的努力。

进入21世纪,经济社会的全球化进一步迅速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已超越地区及国境流动而把全球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国际竞争的日趋激化,正使大城市和大城市群逐步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中国来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参与国际竞争,建设世界强国,必须以国家战略,推进并加快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及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1988):《中国大城市地区城市化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2. 王桂新等(2003):《人口与发展:上海、东京的比较》,《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3. 王桂新(1997):《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各年。

(责任编辑:朱犁)

ABSTRACT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at Birth and Strict Population Control

Ma Yingtong • 2 •

China's past lessons from population control and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at birth have exposed problems in the country's 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of popula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ose problems and clarifies the disagreements on population control and sex ratio at birth.

Boy Preference and Induced Abortion in Rural China: Findings from the 2001 Survey

Wei Yan Li Shuzhuo Marcus W. Feldman • 12 •

Using data from the 2001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y preference and induced abortion in rural China during periods with different birth control polici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emporal trends, features and patterns of variation in induced abortion and sex ratio at birth are fundamentally consistent. Among women with only two children, the risk of having an induced abortion to end the next pregnancy for those whose first child is a daughte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or those whose first child is a son. These results reveal that sex-selective abortion is widely prevalent, that boy preference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induced abortion, and that sex-selective abor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ise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rural China.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 Survey in Aba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Zhu Ling • 22 •

It is known that the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creased to high levels during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in Aba Autonomous Prefecture populated by Tibetan and Qiang ethnic groups in Rural Sichuan Province. The phenomena of "ecological poverty", "health poverty" and "educational poverty" are co-existing in the rural areas in Aba. Because the provision of basic health care services is insecure and educational threshold for non-agricultural jobs has been growing,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poor tends to become long-term and irreversible. In order to change the present situ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food assistance should be continuously provided to the hard-core poor groups. Furthermor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huma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promotion in the policie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Huang Ping Frank N. Pieke • 33 •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research on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ought take consideration more seriously of the contribution that migration mak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 of migran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ina has drafted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a viable and prosperous countryside as one of its key objectives.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labor migratio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at seems to be developing is a broader social perspective, and sensitive to the more institutional links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especially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people.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Wang Guixin et al. • 42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progress, scale-space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ystem, migr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ha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ompared with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main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is area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in national strategy.